

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佟麟阁：一腔热血荐轩辕



佟麟阁像。新华社发

在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北口，一尊铜像静静矗立。它以铸铜为主要材料，顶部雕刻两尊麒麟。怀表上的时间，定格在抗日英雄佟麟阁将军为国捐躯那一刻(1937年7月28日下午2点30分)，以纪念这位全民族

抗战爆发后殉国首位高级将领。佟麟阁1892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户农民家庭。八国联军入华后，年幼的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屈辱与人民的苦难，从此萌发从戎救国之念。

早年，他投身冯玉祥部队成为哨兵，因英勇善战、善于用兵，先后升任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旅长，参加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。1933年，佟麟阁参加长城抗战，取得喜峰口大捷。同年，他与冯玉祥等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，先后收复康保、宝昌、沽源、多伦等失地，重创日军。后退出北平香山。

1936年，佟麟阁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副军长。当时，形势极其严峻，只有北平的西南面还属第29军的防守之地。为使第29军作战部队全面进入备战状态，让对“和平”依旧抱幻想的官兵尽快觉醒，佟麟阁在深刻分析时局后指出：中日之战不可避免。在一次面对军事训练班学员的讲话中，他动情地说，中央如下令抗日，自己必定身先士卒。

佟麟阁是这么说，也是这么做

的。1937年7月7日，全民族抗战爆发，他向全军将士发布命令，凡有日军进犯，坚决抵抗，誓与卢沟桥共存亡。

日军战机时常低空飞行，炮声震天，战事危急。佟麟阁在给妻子的信中，说“大敌当前，此移孝作忠之时”，请其妻子代为孝敬双亲。从那之后，他便再未归家。

7月28日，日军开始轰炸南苑守军兵营，南苑瞬间成为一片火海。佟麟阁深知，若南苑陷落，日寇便可攻进北平城。面对日军10万以上的兵力和几十辆坦克，他仍在前线率领官兵顽强抵抗。佟麟阁指挥部队向外突围时，两架日军战机突然袭来，疯狂扫射。佟麟阁腿部中弹，官兵让他撤退包扎，他却说：“个人安危事小，抗敌事大！”后忍痛继续指挥。敌机再次俯冲而下，一颗炮弹落下，佟麟阁因头部不幸被击中壮烈殉国，年仅45岁。

1938年，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，说佟麟阁等人“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”。1946年，国民政府对佟麟阁进行了隆

重的国葬，将西城区一条街更名为佟麟阁路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佟麟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，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。

暑期以来，坐落于北京香山的佟麟阁将军纪念馆迎来一批批年轻参观者。翻开纪念馆留言册，笔迹各不相同，表达的是同样的敬意：“我们要学习先烈遗志，面对困难不退缩”——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学生；“其勇毅烈如火，其忠魂若星辰”—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；“你们未走完的路，我们继续前行”——北京市丰台区嘉园小学学生……

“每年都有万余参观者前来，回顾抗战历史，瞻仰佟麟阁雕像，参观佟麟阁将军故居，祭拜佟麟阁将军墓，汲取英雄精神力量。”纪念馆办公室工作人员崔超英说。

如今，在北京香山的山坡上，佟麟阁亲手栽种的枣树仍在向上生长；以佟麟阁命名的北京市佟麟阁学校里，琅琅书声悠扬回荡。英雄仿佛从未离去，因他早已融入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(据新华社)

黄振亚：枪林弹雨中的琼崖抗日脊梁

海南岛西北，一方灰黑的火山岩砖静静地躺在一个离海不远的村庄空地上。这是被熊熊战火吞噬后，抗日英烈黄振亚曾经住过留下的唯一印迹。85年前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黄振亚，在一场与日寇的遭遇战中，血洒乡土，结束了短暂而壮烈的一生。

黄振亚，190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新坊井村，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儋州地区(时称儋县)兴起抗日救亡运动。时任中共儋县县委委员的黄振亚深入渔港和乡村组织宣传抗日救亡，并发动组建抗日武装队伍。该武装力量后并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。

1939年4月，日军在汉奸引导下入侵儋县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5月11日，国共联合武装力量计划在儋县黑岭伏击日军，不料日军突然增援，对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游击队实施反包围。枪炮声越来越近，黄振亚得知战况后，带领指战员迂回疾行到敌人背后奇袭，不但冲垮了日军阵地，还将其切割成数段致使首尾不能相顾。天黑后，日军残部狼狽逃窜。黄振亚之名从此威震周边日军。



这是位于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的黄振亚烈士纪念碑。新华社发

约一个月后，日伪军大举进攻儋县抗日村庄。时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的黄振亚率大队驰援，猛烈攻击日敌后背，再次将其打得溃不成军。撤退之前，日军向黄振亚

所部施放毒气。在部分人中中毒后，他仍率其余战士英勇向前，最终日军仓皇撤离。

1940年4月初，35岁的黄振亚协助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工作，赴

儋县组建第六大队。他率领20多名干部、战士和军械工人途经儋县东成抱舍墟时，与日军相遇，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。

尽管烽火连天的岁月已经远去，黄振亚的抗日救亡事迹一直为后世铭记和传颂。2014年9月，黄振亚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

如今，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。在琼崖抗日脊梁黄振亚的影响下，村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，让这座曾经历经苦难的村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：简陋的砖瓦房换成了一栋栋小洋楼；坑洼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；纵横交错、整洁顺畅的街道，不断焕发着新气象。

当地还先后为黄振亚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及配套工程，描着黑底金字的石碑在树林掩映下显得格外庄严。

在黄振亚烈士纪念碑前，前来祭拜的人群向纪念碑鞠躬并敬献花束。“缅怀革命先烈，传承红色基因，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畏艰难，勇当先锋！”一名年轻党员说。(据新华社)

一台缝纫机的“支前往事”

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里，陈列着一台绿色脚踏式缝纫机：机长93厘米，宽45厘米，高103厘米，不大的机身却透着岁月的厚重感。机身雕镂的“SINGER”字样清晰可辨，正是当年美国知名缝纫机生产商“胜家”的品牌名。这台旧式缝纫机的历史，要追溯到90多年前的南昌起义。在它历经岁月沧桑的外表背后，隐藏着一段南昌起义军民同心的动人往事，见证着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发自内心的拥护之情。

1927年8月1日，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南昌成为起义地点，不仅因此地敌军力量薄弱，更源于大革命时期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——城中留存的党员、团员如同火种，点燃了工人、农民、学生等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，他们迅速组织起来，为起义军提供有力支援。

起义前，100余名铁路工人、锯木工人连夜抢修涂家埠大桥，确保运载贺龙、叶挺部队的火车顺利抵达南昌，为起义力量集结提供重要保障。部队进城后，南昌城瞬间洋溢起节日般的气氛，街头巷尾张灯结彩，市民高呼口号

热烈欢迎叶、贺部队。工会、农会、商会、学联和妇女解放协会等群众团体纷纷设立慰问站，有的为部队送来粮食、蔬菜、木柴等生活物资，有的帮战士缝补衣物、代写家信，还有的主动参与伤病员救治工作。人民群众的全方位支持，极大地鼓舞了起义部队的士气。

南昌起义正式打响后，工人纠察队、农民自卫军及公安局保安队迅速投入战斗，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运送弹药、救护伤员。在状元桥一带，省农民协会干部与起义部队并肩作战，坚决阻断敌军北逃的路线。

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，起义军成功占领南昌城。南昌各界民众被起义军的壮举深深鼓舞，大批工人、学生和郊区农民踊跃参军。据统计，仅南昌鸿声中学就有六七百名学生加入起义军，其中大部分跟随部队踏上南征之路。新战士的大量加入，使军服供应一时陷入紧张。消息传到南昌城的裁缝铺，缝纫工人们纷纷拿出自家的缝纫机，自发集结成支前队伍。

当时没有电动设备，缝纫全靠脚踏踏板驱动机器。为赶在部队撤离前完成军服赶制，工人们日夜守在缝纫机旁，脚踩得飞快，手指在布料间翻飞。

昏暗的油灯下，脚踏板发出的“咯吱”声与布料的“沙沙”声交织成一曲动人的支前乐章。南昌市民固路的缝纫工人万国生，是这支支前队伍中的一员。时隔多年，他仍清晰记得起义军进驻南昌的情形：“战士们用我们的东西、买我们的东西，一点也不亏待我们老百姓。记得那时天气很热，有许多战士拿长裤到我的店里改成短裤穿，从没有给过一分钱。而且，剩下的布料也全给了我。就是平常士兵向我要一点开水喝，都给钱。”

起义军进驻南昌期间，始终保持着严明的纪律，与当地群众相处融洽，完全没有旧式军队的欺压作风。起义军的亲民举动，感染了越来越多的群众，全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整理的《记八一南昌起义》记载：“(8月1日)九点钟以后，商店还是照常开门营业。街上，人愈聚愈多，当人们经过总指挥部门前时，都举手欢



群众为起义军赶制军服时用过的缝纫机和尺子。(资料照片)

呼。南昌人民送了很多牛肉、西瓜，慰劳起义军。”8月2日，南昌各界3万多名群众参加了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，声势之大前所未有，尽显对起义的热烈支持与拥护。

1958年，万国生将自己当年为起义军缝制军服的缝纫机和尺子，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。如今，这台缝纫机虽已锈迹斑斑、板面龟裂，却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革命文物，承载着那段浓浓的军民鱼水情，见证了人民群众拥戴人民军队的热忱之心。历史早已证明：人民军队的强大，不仅在于力量和意志，更在于这支队伍扎根人民、依靠人民、为了人民，这正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战胜的力量源泉。(据《中国国防报》)

源怀巡察 亲戚朋友全不认

北魏时期(386年-534年)，朝中有位大臣名叫源怀，他在为官期间，不仅政绩卓著，而且还是一位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的正直之士。

北魏延兴元年(471年)，孝文帝拓跋宏将都城由平城(今山西大同市)迁至洛阳后，一些边远地区的地方官认为这下“天高皇帝远”了，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，便以权谋私，贪污受贿，贪赃枉法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，弄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这一情况传至京城后，孝文帝就派大臣源怀为特使，持节加侍中行台巡视北边六镇及恒、燕、朔三州，赈济贫民、考察民风、考核这些地方官员的政绩，所有事务可先行处置再上报。

沃野(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)是北魏北方六镇之一，当时皇后之父于劲权势滔天，其兄于祚与源怀是旧亲，时任沃野镇将。源怀在沃野巡视时，发觉于祚多行纳贿和不法之事。对此，源怀该如何抉择呢？源怀经过反复思考，权衡利弊，最终，不畏权臣，不徇私情，毫不留情地如实向朝廷奏报，将于祚弹劾罢官。

北魏北方六镇之一——怀朔(今内蒙古包头市)镇将元尼须是一个贪污枉法，声名狼藉，罪恶累累的不法之徒，他深知自己罪恶深重，国法难容，但他又认为自己与源怀是自幼就相识的老朋友，心想源怀总该会念及旧情，有所关照的。于是，当源怀来到怀朔巡视时，元尼须备办了丰盛的酒宴来款待。

席间，元尼须乘机对他求情说：“我的仕途命运如何就完全依赖老朋友了，难道你就不念旧情，宽恕一点吗？”源怀果断地说道：“今天在这里我只是作为老朋友相聚饮酒，不谈其他。明天在公堂之上，我才就是使者，也是查问镇将罪行的场所。”这番铿锵话语说得元尼须无言以对。

后来，源怀如实将元尼须的罪行向朝廷呈奏，终将元尼须弹劾治罪。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唐太宗与制糖技术

甜是一种人人都爱的味道。可你知道吗，今天厨房里随手可取的白砂糖，在中国，竟是1300多年前才出现的稀罕物。而推动这一切的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。

其实，中国人吃到甜味的历史很长，《诗经》里就有“周原膺膺，萋萋如飴”的句子，《礼记》也记载了子女侍奉父母要用“枣栗饴蜜”。可见早在周代，先民就已掌握了熬制饴糖的技术。甘蔗在中国扎根也很早，战国时期岭南一带就已有它的身影，可那时的人还不会用甘蔗做糖，只把它当水果啃，或榨汁饮用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写“脰鳖炮羔，有柘浆些”，“柘浆”就是甘蔗汁。后来人们把蔗汁熬浓，做成“蔗糖”或“蔗浆”。到三国时，吴国末帝孙亮曾派人去仓库取“甘蔗饴”，算得上宫中难得的甜点了。

还有一种叫“石蜜”的东西，唐代以前偶尔出现，也叫得含糊——有时指西域山崖里的野蜂蜜，有时指蔗汁加乳熬成的硬糖，有时也指外国进贡的砂糖，东汉张衡《七辩》中就提到了“沙糖石蜜，远国储珍”，可惜当时中国还没学会这门手艺。

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，一支身份特殊的使团从长安出发，向西而去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天竺摩揭陀国，即今天的印度比哈尔邦一带。据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，那年摩揭陀国遣使来朝，献上波罗树。唐太宗品尝了对方带来的蔗糖，觉得干燥易储、食用方便，当即决定遣使取经，将那熬糖之法学到手。

使团学成归来，太宗下诏令扬州进献上等甘蔗，依样熬制。令人好奇的是，扬州并非甘蔗主产区，为何偏偏选在这里？或许因为扬州是当时东南最繁华的商业都会，水路通达，可以从岭南运来甘蔗加工；又或许当时扬州一带本就种着品质优良的甘蔗。无论如何，扬州工坊里熬出的糖，“色味愈西域远甚”，品质竟反超了原产国。到了唐高宗时，王玄策又奉命从印度请来十位制糖专家，利用“竹甑法”制出了颜色更浅、颗粒更细的精沙粒糖。从此，中国人不仅学会了制糖，还越做越好。

甘蔗的甜蜜旅程当然没有止步于唐代。到了宋代，匠人们又玩出了新花样——冰糖，那时叫“糖霜”或“糖冰”。南宋王灼写了一部《糖霜谱》，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冰糖工艺专著。北宋时四川遂宁一带的匠人还发明了“窖制法”，把蔗浆倒入大缸，插入竹条，盖上盖子静静等候，待到蔗浆析出晶莹的结晶，再沥缸、晾晒，那小小的团块便是糖霜。黄庭坚收到梓州雍熙长老寄来的糖霜，高兴地写诗称赞：“远寄蔗霜知有味，胜于崔浩水精盐。”苏轼也毫不吝嗇地赞美：“冰盘荐琥珀，何似糖霜美。”元代洪希文在《糖霜》诗中更是细细描摹：“春除甘蔗榨为浆，色弄鹅儿浅浅黄……携来已见坚冰渐，嚼过谁传餐玉方。”从诗中那鹅黄的颜色、坚冰般的外形，可想见冰糖在当时是何等珍奇的美味。(据《联谊报》)

邹韬奋投稿

1915年，家道中落的20岁青年邹韬奋陷入经济绝境。在上海南洋公学的阅览室里，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上“请领稿费”的启事，让他燃起了投稿求生的念头。

最初的投稿经历充满了青涩和困难。因为缺乏经验，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。思索多日，邹韬奋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：他钻进学校图书馆，翻阅体育、科学方面的英文杂志，从上面选取一些关于卫生健康、科学发明之类的短文章，翻译出来后，试着投稿。一开始寄出的稿件如同石沉大海。然而，这并未消磨他的意志，他依旧伏案疾书。

转机在一日清晨悄然降临。邹韬奋习惯性地翻开新刊报纸，副刊版面上“谷曾”二字赫然入目，这正是他给自己取的笔名！他反复核对署名，良久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月底领稿费那日，他与二弟邹恩泳攥着新刻的印章，一路小跑奔至棋盘街的申报馆，领到了6块大洋，兄弟俩喜出望外，激动不已。

后来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学生杂志》成为他的新目标。彼时杂志名家云集，杨贤江、萧公权的文稿让他心生敬意，也暗自发誓较劲。他摒弃了单纯的译述，转而聚焦南洋公学千余名学子的真实境遇，撰写学生修养类文章，篇幅也从数百字扩展至数千言。“写自己所知得最清楚的事情”，这句从实践中悟得的箴言，让他的稿件录用率日渐提高。

邹韬奋后来回忆：“我在《学生杂志》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，总是投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。登了一篇之后，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。”即便屡遭退稿，他从不怨怼编辑，反倒早体会到了“做编辑的苦衷”。

邹韬奋这段青年时期的投稿经历，为日后创办《生活》周刊锤炼了求真务实、坚持“为大众发声”的精神底色。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